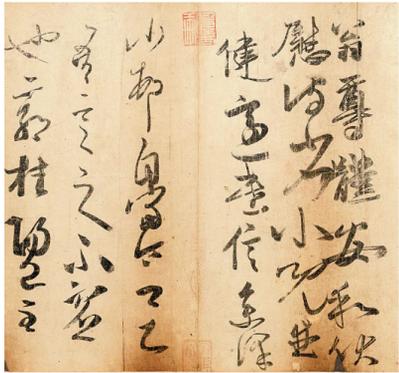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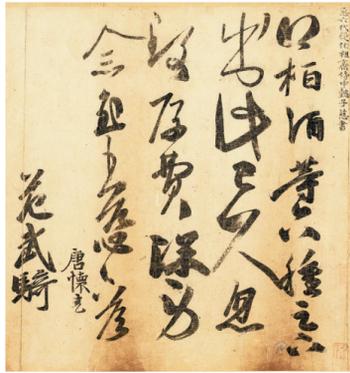
# 启功:《唐摹万岁通天帖》书后

王羲之的书法,无论古今哪家哪派的评价如何,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总是客观存在的。又无论是从什么角度研究,是学习参考,还是分析比较,那些现存书迹总是直接材料。世传王羲之的书迹有两类:一是木版或石刻的碑帖;一是唐代蜡纸钩摹的墨迹本。至于他直接手写的原迹,在北宋时只有几件,如米芾曾收的《王略帖》等,后来都亡佚不传,只剩石刻拓本。木版或石刻的碑帖,从钩摹开始,中间经过上石、刊刻、捶拓、装渍种种工序,原貌自然打了若干折扣,不足十分信。于是直接从原迹上钩摹下来的影子,即所谓“双钩廓填本”或“摹拓本”,就成为最可信的依据了。这类摹拓本当然历代都可制作,总以唐代硬黄蜡纸所摹为最精。它们是从原迹直接钩出,称得上是第一手材料。字迹风神,也与辗转翻摹的不同。只要广泛地比较,有经验的人一见便知。因为唐摹的纸质、钩法,都与后代不同。这种唐摹本在宋代已被重视,米芾诗说“温来鹅去已千年,莫怪痴儿收蜡纸”。可见当时已有入把钩摹的蜡纸本当作王羲之的真迹,所以米芾说他们是“痴儿”。到了今天,唐摹本更为稀少,被人重视的程度,自然远过宋人,便与真迹同等了。现存的摹本中,可信为唐摹的,至多不过九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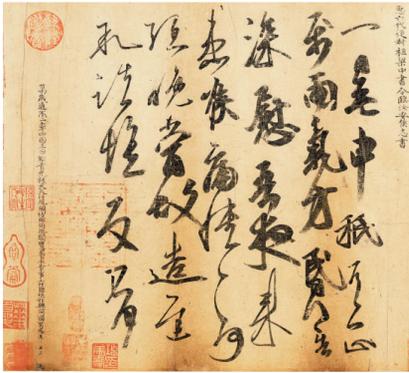
## 一、现存唐摹王羲之帖概观



▲第四帖王羲行草书《箭尊帖》(局部)



▲第八帖王羲行草书《相和帖》



▲第十帖王志行书《候中帖》

现存唐摹王羲之帖,在三十年前所见,计有:一、《快雪时晴帖》,二、《奉橘》等三帖一卷(俱在台湾地区),三、《丧乱》等三帖一卷,四、《孔侍中》等二帖一卷,以上俱带名款;还有《游目帖》(俱在日本)虽不带名款,但见于《十七帖》中。近三十余年中发现的重要唐摹本首推《姨母》等帖一卷(在辽宁)、《寒切帖》(在天津),以上俱带名款;还有《远宦帖》

(在台湾地区),虽不带名款,但见于《淳化阁帖》;《行穰帖》(在美国),无名款。以上各帖,《游目》闻已毁于战火,《寒切》墨色损伤太甚,《快雪》纸色过暗外,其余无不精彩逼人。有疑问的,这里都不涉及。在三十余年前,论唐摹本,都推《丧乱》和《孔侍中》,因为这两件纸上都有“延历判定”的印迹。延历是日本桓武帝的年

号,其元年为公元782年。日本学者考订这两件是《东大寺献物账》中著录的。按,《献物账》是日本圣武皇帝皇后将遗物供佛的账目,圣武卒于公元729年,那么传到日本时至少在729年以前,摹拓自更在前,证据比较有力。自从三十余年前《姨母》等帖出现后,所存唐摹王羲之帖的局面,为之一变。

## 二、《姨母》等帖

唐摹王羲之帖,不论是现存的或已佚的,能确证为唐代所摹的已然不易得;如可证在唐代谁原藏、谁摹拓、何年何月,一一可考的除了这《姨母》帖一卷外,恐怕是绝无的了。

所说《姨母》等帖,是唐代钩摹的一组王氏家族的字迹。现存这一卷,是那组中的一部分。这卷开头是王羲之的《姨母》《初月》二帖,以下还有六人八帖。卷尾有“万岁通天二年王方庆进呈原迹”的衔名。在唐代称这全组为《宝章集》,宋代岳珂《宝真斋法书赞》卷七著录,称这残存的七人十帖连尾款的一卷为《万岁通天帖》,比较恰当,本文以下也沿用此称。

先从文献中看唐代这一组法书的摹拓经过:唐代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卷六载窦泉《述书赋》并其兄察蒙的注,《赋》的下卷里说:

“武后君临,藻翰时欻。顺天经而永保先业,从人欲而不顾兼金。”察蒙注云:“则天后,沛国武氏,士族女。临朝称尊号,日大周金轮皇帝。时

凤阁侍郎石泉王公方庆,即晋朝丞相第十世孙。有累代祖父事迹,保传于家,凡二十八人,辑为一十一卷。后墨制问方庆,方庆因而献焉。后不欲夺志,遂尽摹写留内,其本加宝饰锦缡,归还王氏,人至于今称之。右史崔融撰《王氏宝章集·叙》,具纪其事。”

《法书要录》卷四载失名《唐朝叙书录》,亦述此事而较略。末云:“神功元年五月,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……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……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《宝章集》以叙其事。复以《集》赐方庆,当时举朝以为荣也。”

五代时刘昫《旧唐书》卷八十九《王方庆传》说:

“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,尝访求右军遗迹。方庆奏曰:‘臣十年代从伯祖羲之,先有四十余纸,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,先臣并以进之,唯有一卷现今存。又进臣十一代祖,十代祖洽,九代祖珣,八代祖昙首,七代祖僧绰,六代祖仲宝,五代祖羲、

高祖规、曾祖爽,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,共十卷。’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,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《宝章集》以叙其事,复赐方庆,当时甚以为荣。”

按以上三条记载,“神功元年”当然不确,因为现存卷尾分明是万岁通天二年;人数不同,有计算或行文不周密的可能;卷数不同,有传抄传刻之误的可能;都无关紧要。只有赐还王氏的是原迹还是摹本这个问题,察蒙说得最清楚,是“遂尽摹写留内”。岳珂跋赞也依察蒙的说法。或问这“赐还”“留内”的问题,“干卿底事”?回答是:摹拓本若是“留内”的,则拓法必更精工,效果必更真实,我们便更可信赖了。

## 三、《万岁通天帖》的现存情况

王方庆当时进呈家藏各帖,据《旧唐书》所记有三组:羲之为一卷,是一组;导至褒九人为一组,分几卷不详;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为一组,分几卷不详。

至于摹拓本是否拆散原组重排,已无从查考。但看命名《宝章集》,又令崔融作序的情况,应是一番整理的。

现存这一卷,为清代御刻旧藏,今在辽宁省博物馆。所剩如下的人和帖:

《姨母帖》行书,纸本,现藏辽宁省博物馆。《唐摹万岁通天帖》之一。字间多断,顿挫,除“奈何”两字上下牵连,其余都字字独立;笔画凝重,朴拙,其“哀痛摧剥,情不自胜”的心绪直露无遗。

《初月帖》,纸本,辽宁省博物馆藏。此帖为《唐摹万岁通天帖》之二。王羲之又名“正”,为避父讳,“正月”书为“初月”。首句“山阴之报”,知此帖写于山阴。山阴是会稽郡郡治所在地。穆帝永和七年(351)王羲之赴山阴为会稽内史,其年49岁。此帖当是其49岁以后所写,是王羲之留存至今最好的书帖之一。此帖用笔、结字和章法都有章草的特点。

梁代陶弘景在与梁武帝《论书启》中云:“逸少自吴兴以前,诸书犹为未称。凡厥好迹,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。”此书正当其时,大有晋人恣纵风流、傲物任情的俊气,逸笔草草,率意畅达,天真自然。

王荟《疋踵帖》《翁尊帖》,见于辽宁省博物馆藏的《唐摹万岁通天帖》,唐摹本。

《新月帖》,见于辽宁省博物馆藏的《唐摹万岁通天帖》,传为王徽之书,唐摹本。此帖以行楷为主,挥洒自如,笔法多变,妍美流畅。宋代《宣和书谱》评其书法“字字亦自前胜”。

《廿九日帖》,硬黄纸,唐摹本,行楷书。纵26.37厘米,横11厘米,辽宁省博物馆藏。《廿九日帖》为《万岁通天帖》中第六帖。此帖用笔秀媚飘逸,风流俊美,笔意连贯而舒展,章法生动,感之意犹未尽,回味无穷。出入右军法中,师古创新的面貌跃然纸上。此帖双钩技术精妙,有下真迹一等之誉。世传王氏父子真迹,当推此帖为冠,为研究王氏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。除流传的献之楷书《洛神赋》外,其书多是行草书,此帖中有些字几近楷书,尤为难能可贵。

《王琰帖》(又称《太子舍人帖》),见于辽宁省博物馆藏的《唐摹万岁通天帖》,传为王僧虔书,唐摹本。王羲之《相和》《汝比》帖见于辽宁省博物馆藏的

《唐摹万岁通天帖》。

王志行书《候痛帖》又称《一日无申帖》,见于辽宁省博物馆藏的《唐摹万岁通天帖》。今装次序如此,与《宝真斋法书赞》《真赏斋帖》迥异。共七十帖。原有人数,按《旧唐书》所记,三组应是三十九人,今卷所存仅五分之一,如按察蒙所说“凡二十八”,则今卷也仅存四分之一。帖数也不难推想,比原有的必然少得很多。今存这卷内有北宋时“史馆新铸之印”,又曾刻入《秘阁续帖》。《续帖》今已无传,清末沈曾植曾见张少原藏残本,中有此卷,见《寐叟题跋》,所记并无溢出的人和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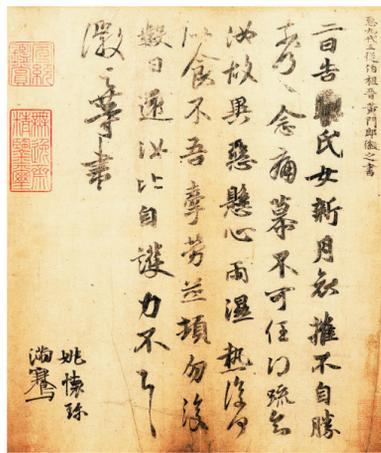
到南宋时在岳珂家,著录于《宝真斋法书赞》卷七,缺了荟、志二人的衔名和《疋踵》《候痛》二帖文。《宝真斋法书赞》是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的,可能是《永乐大典》抄失或四库馆辑录时抄失。今卷中二人衔名及二帖俱存,可知岳氏时未失。《宝真斋法书赞》中已缺僧虔衔名,岳氏自注据《秘阁续帖》补出,是齐司空简穆公僧虔。又《翁尊帖》一帖列在《汝比》帖后,是王羲之的第三帖。《真赏斋帖》列于王僧虔后,王羲之前,成了失名的一人一帖。

今卷次序,与《三希堂帖》同,成了王荟的第二帖。细看今卷下边处常有朱笔书写数目字,《翁尊帖》一纸有“六”字,《汝比》一纸有“七”字,其他纸边数码次序多不可理解。可见这七十人十帖,以前不知装裱多少次,颠倒多少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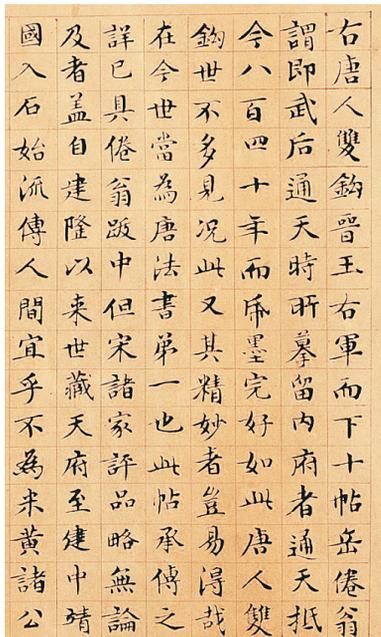
以书法风格看,与王羲之接近,岳珂所记,是比较合理的。又原卷岳氏跋后赞中纸烂掉一字,据《宝真斋法书赞》所记,乃是“玉”字。

还有察蒙的“泉”字,本是上半“自”字,下半横列三个“人”字,另一写法,即是“洎”字。岳氏跋中误为“泉”字,从白从水。清代翁方纲有文谈到岳氏跋赞都是书手代抄上的,所以其中有误字,这个推论是可信的。今存岳氏字迹,还有一个札子(在故宫),只有签名一“珂”字是亲笔,可见他是勤于撰文而懒于写字的。

清初朱彝尊曾见此卷,说有四跋,为岳珂、张雨、王羲、文徵明(见《曝书亭集·卷五十三·书万岁通天帖旧事》,下引朱氏文同此)。今王跋已失,当是入乾隆内府时撤去的。乾隆刻帖以后,这卷经过火烧,下端略有缺笔处。



▲第五帖王徽之行书《新月帖》



▲文徵明《跋唐摹万岁通天帖》(局部)

《万岁通天帖》虽是有本有源、有根有据的一件古法书的真面貌,但在流传过程中却一再受到轻视。明代项元汴是一个“富而好古”的商人,其家开有当铺。一般当铺只当珍宝,他家当铺却并当书画。于是项氏除了收买书画外,还有当来的书画。他虽好收藏书画,却并没有眼力,也常得到假造的、错误的。

所谓错误,即是张冠李戴,认甲成乙。举例如元末杨遵,也号“海岳庵主”,与宋代米芾相重。有人把杨的字冒充米芾的字,他也信以为真。他还常把得到“价浮”的书画让他哥哥项笃寿收买,所谓“价浮”,即是认为不值那些钱的。

这卷即是项元汴认为“价浮”的,所以归了项笃寿,事见朱彝尊文。按这卷煌赫法书,可谓无价之宝,而项元汴竟认为不值,足见他并无真识。这是此卷受屈之一;又乾隆时刻《三希堂帖》,以《快雪时晴帖》为尊,信为真迹,而此卷则列于“唐摹”类中,这是受屈之二。

推论原因,无论明人清人何以不重视它,不外乎看到它明明白白写出是“钩摹”本,而杨遵被明人信为米芾,《快雪》被清人信为真迹,都因上无“充”字、“摹”字,所以“居之不疑”,也就“积非成是”了。可笑的是那么厉害的武则天,也会错说出一句“是摹本”的真话,竟使她大费心思制成的一件瑰宝,在千年之后,两次遇到“信假不信真”的人!

《万岁通天帖》的可贵处,我以为有三点值得特别提出:

一、古代没有影印技术时,只凭蜡纸钩摹,同是钩摹,又有精粗之别。有的原帖有残缺,或原纸昏暗处,又给钩摹造成困难,容易发生失误。即如《快雪》中“羲”字,笔画攒聚重叠,不易看出行笔的痕迹。当然可能是书写时过于迅速,更可能是出于钩摹不善。《丧乱》《孔侍中》二卷钩摹较精,连原迹纸上小小的破损处都用细线钩出,可说是很够忠实的了。但也不是没有失误处。其中“迟承”的“承”字,最上一小横笔处断开,看上去很像个“咏”字,原因是那小横笔中间可能原纸有缺损处,遂摹成两笔。“迟承”在晋帖中有讲,“迟咏”便没讲了。至于《万岁通天帖》不但没有误摹之笔,即原迹纸边破损处,也都钩出,这在《初月帖》中最为明显,如此忠实,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个摹本的信赖之心。所以朱彝尊说它“钩法精妙,锋神毕备,而用墨浓淡,不露纤痕,正如一笔独写”,确是丝毫不夸张的。

又王献之帖中“奉别悵悵”四字处,“别悵”二字原迹损缺一半,这卷里如实描出。在《淳化阁帖》中,也有此帖,就把这两个残字删去,并把“奉”“悵”二字接连起来。古代行文习惯,“奉”字是对人的敬语,如“奉贺”“奉赠”之类,都是常见的,“奉别”即是“敬与足下辞别”的意思。一切对人不敬不利的活,不能用它。假如说“奉打”“奉欺”,便成了笑谈。“悵”上不能用“奉”,也是非常明白的。大家都说《阁帖》文辞难读,原因在于于古代语言太简,其实这样脱字落字的句子,又怎能使人读懂呢?《阁帖》中这类被删节的句子,又谁知共有多少呢?

二、古代讲书法源流,无不溯至锺、张、“二王”,以及南朝诸家。他们确实影响了唐宋诸家、诸派。碑刻大量出土之后,虽然有不少人想否定前边的说法,出现什么“南北书派论”“尊碑卑唐”“碑字”“帖字”,见仁见智,这里不加评论。只是南朝书家在古代曾被重视,曾有影响,则是历史事实。近百余年来所论的“南”“帖”的根据,只不过是《淳化阁帖》、《阁帖》千翻百摹,早已不成样子。批评《阁帖》因而牵连到轻视南朝和唐代书家作品的人,从阮元到叶昌棻、康有为,肯定都没见过这卷一类的精摹墨迹。从书法艺术论,不但这卷中王羲之的三帖精彩绝伦,即其余各家各帖,也都相当重要。像徽之、献之、僧虔三帖,几乎都是真书。唐代张怀瓘《书估》、《法书要录》卷四说:“因取世人易解,遂以王羲之为标准。如大王草书,字直一白,五字(按此‘字’字疑是‘行’字之误)乃敢行书一行,三行行书敢一行真正。”可见真书之难得,这二家二帖之可贵。

自晋以下,南朝书风的衔接延续,在王氏门中,更可看出承传的紧密。在这卷中,王荟、王羲、王志的行草,纵横挥洒,《世说新语》中所记王、谢名流那些倜傥不群的风度,不啻一一跃然纸上。尤其徽、献、僧虔的真书和那“范武骑”真书三字若用刻碑刀法加工一次,便与北碑无甚分别。因此可以推想,一些著名工整的北朝碑刻墓志,在未刻之前是个什么情况。尖笔蜡纸加细钩摹的第一手材料,必然比刀刻、墨拓的间接材料要近真得多。

又《快雪帖》偏左下方有“山阴张侯”四字,观者每生疑问。我认为这是对收信人的称呼,如今天信封外写某处某人收一样。古人用素纸写信,纸面朝外,随写从右端随卷,卷时仍是字面朝外。写完了,右边留一段余纸裹在外层,题写收信人,因常是托熟人携带,所以不一定写得像今天那么详细。这种写法,一直持续到明代文徵明还留有实物。只是收信人的姓氏为什么在外封上写得那么靠下端,以前我总以为《快雪帖》是摹者用四字填纸空处,又重刻了一次,遂有火前本、火后本之说。文氏《停云馆帖》里也刻了一次,王氏《郁冈斋帖》所收即是得到火后本的原石,编入了他的丛帖。

三、明代嘉靖时人华夏把这卷刻入《真赏斋帖》,因为刻得精工,当时几乎和唐摹本同样看待。许多人从这种精刻本上揣摩六朝人的笔法。《真赏》原刻经火焚蚀,又重刻了一次,遂有火前本、火后本之说。文氏《停云馆帖》里也刻了一次,王氏《郁冈斋帖》所收即是得到火后本的原石,编入了他的丛帖。

他这话是从《袁生》一帖推论到《真赏》全帖,评价可算极高,而《真赏》刻手章简甫技艺之精,也由此可见。但今天拿火前初刻的拓本和唐摹原卷细校,仍不免有一些失真处,这是笔和刀、蜡纸和木板(火前本是木板,火后本是石版)、钩描和捶拓各方面条件不同所致,并不足怪。

现在所存王羲之帖,已寥寥可数,而其他各家如王献之以下,更几乎一无所存(旧题为王献之的和未必确出唐摹的不论)。近代敦煌、吐鲁番各处出土的古代文书不少,有许多书写的时代可与羲、献相当。如《李柏文书》又比《兰亭序》早几年,可作比较印证,但终究不是直接的证物。南朝石刻墓志近年也出土不少,则又不是墨迹,和这卷南朝人书迹真影,还有一段距离。我们今天竟得直接看到这七十人十帖,把玩追摹,想到唐太宗得到《兰亭》的喜悦,大概也不过如此;而原色精印,更胜过蜡纸钩摹,则鉴赏之福,又足以傲视武则天了!

## 四、《万岁通天帖》在历史文物和书法艺术上的价值



欢迎扫描二维码 观看相关视频